

傅斯年與抗戰勝利之初 「偽北大」的處置問題

• 賀金林

摘要：抗戰勝利之初，如何處置抗戰期間日本傀儡政權在北平組建的偽北京大學（「偽北大」），是復員回遷的北京大學當局面臨的頗為棘手的一個問題。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高舉民族大義之旗，一再對外強調絕不延聘任何偽北大教員，要「為北大保持一個乾淨的紀錄」，集中體現了他作為一個老北大人濃厚的北大情結。後來在處置偽北大的過程中，北大原有的文學院、理學院與法學院也確實做到了沒有接收一名偽北大教員。然而出於振興學術的現實需要，北大當局不得不採取了較為現實的手法，接受了一部分原來不是北大人的偽北大教職員，以充實新辦的農學院與醫學院。本文在梳理偽北大將近八年辦學歷史的基礎上，對傅斯年的北大情結、以傅為代表的老北大人所堅持的民族大義，與北大當局所面臨的現實困局之間的矛盾，做出一番新的探討。

關鍵詞：傅斯年 「偽北大」 北京大學 民族主義 北大情結

一所大學以擁有眾多知名學者而引人關注，更以其特有的文化精神而享譽學界。一代又一代學人對大學的濃厚情結，是大學得以養成這種文化精神的關鍵所在。肇始於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在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後，逐漸成為了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引領近代中國學術和教育的發展方向。從北大紅樓走出來的學人，其內心深處所固有的一種北大情結，為北大特有的文化精神的養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期，這種情結表現得更為明顯。抗戰勝利之初，即將從昆明回到北平的北大當局，面臨着如何處置正在原址辦學、由日本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下簡稱「華北臨時政府」）——所設的偽北京大學（「偽北大」^①）這樣一個棘手問題。以代理校長傅斯年為首的一批北大學人，要求堅決抵制抗戰期

間曾經進入偽北大任教的教員，不僅使民族大義得以伸張，而且也使北大的文化精神得以進一步弘揚。然而筆者在翻閱有關偽北大的檔案資料後發現，實際情形卻並非人們所想像的單一面向，北大同人對偽北大任教教員的態度也各有不同。北大當局事後出於現實的考量，也並非一律拒絕了所有在偽北大服務的教員。學術界有關傅斯年與抗戰勝利之初偽北大處置問題的研究，多以傅大罵漢奸、拒絕一切偽北大教員的角度展開敘述，較少深入分析究竟是如何處置以及其處置辦法的內在原因^②。總體而言，對偽北大的研究尚未深入，似乎一直都是一個頗為隱晦的話題。本文將在釐清偽北大將近八年辦學歷史的基礎上，對傅斯年本人的北大情結、以傅為代表的老北大人所堅持的民族大義，與北大當局所面臨的現實困局之間的矛盾，做出一個新的探討。

一 近八年的偽北大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戰火很快便燃燒到平津地區的各大學校園。除燕京、輔仁等教會大學以及中國大學等私立大學外，平津各國立大學均開始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主持下，籌劃向西或向南遷移。就在平津地區各高校內遷之時，華北臨時政府開始籌劃將北平原來的幾所大學恢復起來，首當其衝的便是北京大學。1938年初，華北臨時政府利用原北京大學、北平大學與私立朝陽學院的校舍，將原北大與北平大學的文、理、法三個學院合併，同時將原北平大學工學院改組為偽北大工學院，還將私立高級中學女校與私立朝陽學院房屋改設為偽北大農學院。至於偽北大醫學院的設立，則利用了原來北平大學醫學院的房屋與設備改建而成。1939年1月4日，華北臨時政府主持下的「北京大學」（偽北大）正式成立，1月14日補行成立典禮，這所拼湊起來的「北京大學」算是正式啟動，首任總監督是湯爾和。11月湯爾和去世後，繼任總監督為瞿益鏞。1941年4月，根據〈修正北大組織大綱〉，將總監督改稱為校長，此後出任偽北大校長職務的有錢稻蓀、王克敏與鮑鑾清等人^③。

從1938年初偽北大開始籌備，到1945年11月解散為止，該校一共維持了將近八年的時間。與此前北大只有文、理、法三個學院相比，偽北大增加了農、工、醫三個學院，學院數量達六個之多。但在創辦之初，由於學生多不願進入偽北大，而是選擇在燕京、輔仁、中國大學等校就學，因此在校學生人數並不多。1942年3月，燕京大學與協和醫學院被迫關門，兩校中的部分教職員與學生迫於生活與就學的壓力轉入偽北大。根據偽北大方面的統計，1938年畢業生人數最少，只有12人，1939年畢業生人數為18人，1940年為27人（以上三年均只有農學院與醫學院的畢業生），1941年六個學院均有學生畢業，畢業生人數增至442人，此後每年保持在400人上下。1938至1944年間，從偽北大六個學院畢業的學生共計為1,758人^④。

關於近八年期間出任偽北大教授的情況，從各學院的統計資料中大致能夠反映出一個基本面貌^⑤。在偽北大六個學院中，農學院的教授人數最多，約為44人，其中將近一半為日籍教授（且多為名譽教授與額外教授）。醫學院

教授流動性較大，先後出任醫學院教授的有45位之多，其中日籍教授大概佔了四分之一（有些教授選擇中途退出，有些教授則是中途加入，特別是在協和醫學院被迫解散後，該學院教授有多人進入偽北大醫學院）。工學院只有14位教授，其中包括日籍教授2人。北大撤退前並沒有以上三個學院，故此三個學院的教授基本上沒有北大舊人。剩下的文、理、法三個學院則情況各有不同。文學院的情況最為複雜，在1945年尚在職的31位教授中，日籍6人，台籍1人，其餘的24位教授中，曾經擔任過北大教授者，有周作人、馮承鈞、容庚、江紹原、徐祖正與溫公頤等人，是北大舊人最多的一個學院。法學院教授18位，其中3位是日籍，曾經擔任北大教授者僅有偽北大法律系主任劉志敷一人。理學院教授只有13位，且均為中國籍，其中包括因年事已高、無法隨北大南遷的原數學系教授馮祖荀，以及1943年因生計所迫進入偽北大、曾經擔任過北大地質系兼任講師的何作霖。在上述留下來的北大教授中，他們或是因為與周作人關係較為密切（如徐祖正與江紹原等），或因平時本就有親日言行而主動選擇留下（如劉志敷等），但也有一些則是因年事已高無法隨北大南遷（如馮祖荀等），或由於其他原因而被迫滯留在北平，後因生活所迫而進入偽北大者（如馮承鈞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傳播開來，偽北大將何去何從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8月19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復員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主要討論如何處置收復區各專科以上學校的原則問題。按照教育部擬定的方針，日方在收復區所設專科以上學校一律勒令停辦，由教育部迅速選派特派員前往接管其校產設備；而對華北臨時政府所設專科以上學校，則由教育部派員暫時接管，其仍在上課者則暫時維持現狀^⑥。9月初，偽北大照常開學，只是一些日籍教師被停職等待遣返，同時被停職的還有一批在偽北大教授日文的教員，如來自台北、此前一直在偽北大擔任日文教授的張我軍^⑦。至於其他教員則繼續在偽北大維持局面。曾經擔任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的周作人，原本7月底已經送還了偽北大聘書，但到了8月20日覆信偽北大當局，表示接受文學院國文系主任一職^⑧。

9月5日，教育部任命沈兼士為平津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特派員，要求沈迅速前往北平，接收除私立大學與教會大學之外的所有專科以上學校。根據9月25日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通過的決議，官方採取「先甄審後補習」的程序，將對這些學校的學生進行甄別處理^⑨。然而，當教育部特派員到達收復區之後發現，這些學校仍在繼續上課，且以各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區區數人，根本無法對數額如此龐大的學生開展甄審工作^⑩。教育部原擬方案從一開始便已不合實際，故「先甄審後補習」的程序根本行不通，主要面臨着以下難題：首先，由於後方學校教職員未能大批回遷，甄審所需要的大量師資如何解決？如果繼續聘用收復區這些學校的教員，他們自身尚需甄別，能否承擔起甄審學生的重任？其次，雖然收復區各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相繼成立，但尚未建立起較為完備的教育行政組織，各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甄審委員會籌備成立尚需時日。最後，這些學校解散以後，學生無處容身，生活沒有着落，「先甄審後補習」的程序必將形成一段真空時期。

為解決上述困難，教育部決定改變原定的甄審辦法，以盡快讓收復區各地的教育甄審工作步入正軌。10月17日，教育部向行政院呈送的〈設立臨時大學補習班辦法〉決定將收復區上述學校就地解散後，各地根據需要設立臨時大學補習班，以便對此類學生的甄審與補習同時進行。各臨時大學補習班均由各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主持辦理，酌量當地情形盡快辦理登記手續，每滿十班即行考試上課；補習時限定為六個月，學生待補習班結束後，根據考試結果決定分發到相應的學校與年級繼續學業^①。

11月初，平津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將接管的十二所專科以上學校，組成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八個分班^②，共計學生人數達到5,000多人，是收復區各地成立的臨時大學補習班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班主任為北大教育系教授陳雪屏。在補習班辦理過程中，由於後方教員一時無法前往收復區，陳雪屏基本上將這些學校教員的原班人馬徵調到臨時大學補習班之中，甚至一些平日與日本及傀儡政權極力周旋的教員亦在其列，這在後方學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感。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也對北平方面的做法表示出了較大的關注，他在給陳雪屏的信中詢問：「頃據醫學界重要人士來譚，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對舊偽北大醫學院所留鮑鑾衡、徐開、葛啟東、梁鐸等四人。此四人附逆有據，人所共知，與偽北大院長鮑鑾清、劉兆霖均有密切關係。鮑鑾衡係鮑鑾清之弟，徐開係劉兆霖之同鄉，梁並曾充劉之助教。未知何以留用此四人，致頗招物議云云。敬以連連，即請查明糾正見覆為幸。」^③隨着1946年6月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即將結束，大批原來服務於偽北大的教員希望繼續留在北大服務，而這還得取決於北大當局的態度。

二 「宋江出山，李逵打先鋒」

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6月，北大校長蔣夢麟應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之邀，出任該院秘書長。在此之前，以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為代表的一批北大同人，早已對蔣於1941年出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之後不甚關心北大事務深懷不滿。蔣此次出任政府公職，正好又破壞了他在擔任教育部部長之時所定下的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的規矩。北大同人於是群起反對，最後迫使蔣於1945年8月辭去校長職務。誰來接任北大校長之職，各方意見分歧。蔣介石的意中人選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為此由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多次勸說傅，明確表示這是出自蔣介石的旨意。8月17日，傅斯年致函蔣介石，一方面以「斯年賦質愚憨，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三十年來讀書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兼以斯年患惡性血壓高，於茲五年，危險逐年迫切」，因之計劃以在戰後靜養調理為由而婉拒；另一方面又向蔣提出「北京大學之教授全體及一切關切之人，幾皆盼胡適之先生為校長」的建議^④。在眾望所歸之下，9月6日，國民政府任命正在美國的胡適出任北大校長，而在胡適未歸之前，則由傅暫行代理。

作為一個五四運動時期畢業於北大的老北大人，傅斯年雖然長期執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他一直在關注北大的發展，心中有著一種難以割捨的北大情結。這種情結簡單說來，就是作為北大的一員，關心北大的發展、維護北大的聲譽與保持北大的純潔性。傅斯年的北大情結不僅表現在內心非常認同自己是一個北大人，而且在行動上對北大給予特別的支持與關注，甚至為了北大的發展不惜突破一些原則。如他主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對本所的研究人員在其他大學兼職多抱排斥態度，但他自己卻一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一職，且對北大借重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表示完全的贊同與支持。傅兼任之事曾經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人中間引起非議，他自己也為此在1940年向蔣夢麟提出辭呈，但未獲批准^⑮。而在代理北大校長職務這件事上，傅的這種北大情結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傅接受出任北大代理校長一事上，太太俞大綵專門從四川李莊趕到重慶，對其勸阻三天仍然無效，只得接受並感歎傅「這樣犧牲法可佩」^⑯；即便是在卸任北大代理校長職務後，傅仍然是時時都在關注着北大的發展。正如他1946年給胡適的信中所言：「到此後仍滿腦裝着北大的事。」^⑰在抗戰勝利之初，傅深知此時北大面臨的問題甚多，必須有一個頗有魄力之人，為即將復員回到北平的北大掃清障礙。儘管此時他已做好了前往美國就醫的計劃，但為了北大的發展，還是毅然接受了在胡適回國之前出任北大代理校長的繁重任務。在他看來，老師胡適性格較為柔弱，此時不宜出馬，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宋江出山，李逵打先鋒」^⑱。

1945年9月傅斯年上任之初，北大仍在昆明的西南聯大體制之內，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開始為次年5月復員回到平津做各種準備。如何處置偽北大，是傅上任之初所面臨的頭等大事。1945年9月22日，在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進入第三天的首次全體大會上，鑒於淪陷區政權所辦各類學校要求政府承認的呼聲日高，為了避免造成日後的既定事實，傅斯年與吳有訓、許德珩等二十七人聯名提出臨時動議：「請政府立即解散各偽大學，並令後方原有各校不得承認各偽校學生之學籍，其教職員照通案辦理。」傅發言剛完，整個會場掌聲雷動，形成了要求對這些學校師生進行全面清算的一邊倒趨勢^⑲。11月初，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八個分班相繼成立之後，傅卻發現大批偽北大教員進入了補習班繼續擔任教職。11月27日，他向新聞界談話公開表示：「北大將來復校時，決不延聘任何偽北大之教職員」。在傅看來，「偽校之教職員均係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屬附逆之列，將來不許擔任教職。」^⑳

傅斯年的此番講話在後方迅速引起了很多學人的共鳴。抗戰勝利之初，身處後方的學人表現出一種浩然正氣，要求對抗戰期間進入淪陷區政權所設專科以上學校服務的教員處以嚴厲的懲罰。與朱自清同住昆明北門街71號唐家花園的清華生物系主任李繼侗亦非常認同傅的看法。朱曾在1946年3月22日的日記中，記錄了當李得知了陳雪屏在北平主持臨時大學補習班期間延聘這些學校教員的情形後，對陳的做法給予了嚴厲批評^㉑。北大國文系教授羅常培在4月24日給胡適的信中，在描述北平的情形時，同樣對北平方面的做法表示不滿。讓他尤為氣憤的是，竟有臨時大學補習班的教員一再聲稱：「此處

不留爺，另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還有老八路。」在他看來，或許陳雪屏在接收時有他的「不得已」，但卻給即將回國的胡適「留下了麻煩」²²。

與地處後方的學人力主對淪陷區政權所設專科以上學校教員予以嚴厲懲罰不同的是，抗戰勝利之初回到北平的部分學人對之的態度卻較為寬容。針對1945年11月27日傅斯年決不延聘「附逆」的談話，陳雪屏當即向記者公開表示：「傅氏在渝所發表之談話並不能代表政府意見，乃只據個人立場與主見而言。」他進而指出：「至檢舉附逆教職員一事，亦應對附逆有事實根據者始行檢舉。凡非甘心附逆，或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就敵偽所設立之學校者，亦決不能盲目執行。」²³陳後來在回憶傅的文章中曾提到：「在這一個時期，孟真〔傅斯年〕先生和我卻有一段爭執，特別值得一提。他〔1945年〕十一月間來平下了飛機，第一句便問我，和偽大學中先生們有無交往。我回答有的，僅限於在一些必要的場合。他頗表不滿，又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對於傅當時的指責，陳在回憶文章中實感無奈，曾為此解釋道：「我一人接收十二個偽大專學校，並未停一天課，而中央又沒有送大批的教授來幫忙。此後每談到這個問題，他總要發脾氣，他所持的原則是正確的，但我認為，同屬偽教授，大多數人由於種種原因未能離開，不得已而留下，繼續教學，僅極少數人甘心附逆，我且曾幾次勸孟真先生分辨良莠，多和前者接觸，以安定北方的教育界。」²⁴與陳雪屏持有相同看法的，還有此間已經回到北平、正在主持北大復校前期準備工作的鄭天挺。他在後來回憶北平情形時也曾指出：「我到北平後，情況與我們在昆明的想像不同。這時北平各大學正在上課，不能接收。而教育部又派陳雪屏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主任，故學校先由補習班接管，原校中人員亦大多未動。」²⁵

陳雪屏所言「以安定北方的教育界」，無疑是另有所指的。作為此時主持辦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之負責人，他的最大期望是補習班能夠平穩結束，不致出現太多的波折。然而補習班從籌備成立伊始，就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如前所述，由於大批地處後方的學人一時無法趕到北平，陳不得不在北平就地聘用大批教員，這不僅引起了後方學界中人的普遍非議，甚至連朱家驊也對之頗有微詞。再加上補習班成立以後，學生發起要求與地處後方的各國立大學學生取得同等待遇的「反甄審」運動，更是讓陳非常頭痛。對於大多數臨時大學補習班的教員來說，他們則一直在為補習班結束之後的出路發愁，因之為補習班當局製造麻煩，陳也只好在盡力求安定中完成任務。正如他在1946年6月8日給朱家驊的信中所言²⁶：

北平補習班成立以後，表面雖尚平順，而中間因異黨之活動，學生心理之脆弱，以及人事之糾紛，百計應付，煞費心力。較諸一般大學有規矩可循者，自大異趣。生所持原則，為消弭異黨之陰謀，引導青年使入正規。遇有問題，班中能解決者，徑解決之，不敢時以瑣細，上瀆清聽。數月以還，地方各界尚予以好評。然若純就教育觀點以衡之，時見瑕疵，可不待言。生但求心之所安，利於黨國。外間毀譽，從不計較。及朋偶有指責，也逆來順受，不願嘮嘮聲辯。

抗戰勝利之初，在如何處置曾經出任傀儡政權所設專科以上學校教職的教員問題上，身處收復區的學人與身處後方的學人之間有着較大的分歧。主持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的陳雪屏為了盡快完成局勢的平穩過渡，同時也是為了安定人心，不得不將這些學校的教員大批予以聘用。北平方面的做法讓身處後方的學界中人極度反感，他們認為應該站在忠奸之辨的立場上對相關教員予以嚴懲，使民族大義得以聲張。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更是嚴重聲明，復員回到北平的北大將絕不聘用任何偽北大教員。不過隨着北大復員之期臨近，即將回到北平的傅也不得不面對複雜的北平局面。

三 「為北大保持一個乾淨的紀錄」

1946年8月4日，即將卸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在北平《經世日報》撰文指出：「我這幾個月負北京大學的責任，實在一無貢獻，所做都是些雜務的事，只有一條頗堪自負的，便是『分別涇渭』，為北京大學保持一個乾淨的紀錄。」^{②7}傅之所以要對曾經出任偽北大教職者採取如此嚴厲的態度，主要是出自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個擔憂是偽北大會打着北大的牌子繼續存在下去，這將會影響北大的辦學聲譽；第二個擔憂則是偽北大教員進入即將復員回到北平的北大，這將給北大的純潔性帶來致命的損害。

首先，在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即將結束之際，偽北大會不會打着北大的牌子繼續辦下去，是以傅斯年為首的老北大人最為擔憂的事情。早在1920年代，「北大教師當時分為兩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學生，以胡適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學生，領頭的是李石曾。這兩派明爭暗鬥，互不相容。」^{②8}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李石曾利用其在政界的地位（李為清末大學士李鴻藻的第五個兒子，國民黨的四大元老之一），在北平大力推行大學區制，將平津的大部分國立大學合併為國立北平大學，並擔任首任校長^{②9}。雖然1929年8月大學區制遭到了北平學界的強烈反對而黯然退場，但北平大學得以保留。抗戰期間北平大學西遷，與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大學合組為西北聯合大學，但西北聯大僅僅運行了一年時間，便因內部意見分歧而分道揚鑣，解體為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與西北工學院等五所學校。抗戰勝利之初，北大出身、此時正擔任教育部部長的朱家驊，堅決拒絕了北平大學校友會的復校請求^{③0}。

至於偽北大的去向如何，老北大人也一直頗為擔憂。1946年4月，當北大還在昆明即將回遷北平之時，由於交通工具的嚴重缺乏，西南聯大內部有人建議是否推遲復員，傅斯年當即表示堅決反對。他在4月5日給湯用彤的信中述及當前北大回遷的艱難局面時說：「目下形勢，清華、南開實可羨慕他們有決定他們走不走的自由，北大則無之。假如弟在清華，弟將主張只在北平開一年級，其餘緩一年，以便觀望。（明年未必好，觀望即是很好的安心丸）但北大情形不如此。北平有幾千學生，假如北大不去，他們〔偽北大〕必要求掛起北大（至少分校）的牌子來。目下政府尚未民主，而威權一落千丈，是會答應的。」他進而指出：「然則，我們如不於暑假在北平升旗，北平必出來

『北大』，或許客氣些叫北京大學分班，或更客氣些叫北平臨時大學（無補習班三字），然必有『北』、『大』二字，必簡稱北大，從此據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儀器，而以正統自居。即使明年我們能再去，亦將託庇於他。於是北大以偽教授為主體，尚堪問乎？」^②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之所以在北大復員問題上力求盡快完成，最為擔憂的是如果在臨時大學補習班結束之後，北大的旗子沒有在原址上升起，偽北大將會繼續在原址辦學。這對於講求正統地位的北大而言，無疑是最不能夠接受的局面。

其次，如何處置偽北大教員，給北大當局出了一道難題。「七七事變」爆發之後，當北大向南遷移之時，多數學人選擇跟隨學校當局行動，只有少數人繼續留守在北平。如當時選擇留守北平的四位教授馬裕藻、周作人、孟森與馮祖荀（他們起初由北大校方每月發放維持費50元^③），除了周作人以外，其他三位均因為年事已高而無法南遷。孟森身陷淪陷區貧困交加，在1937年底去世。馬裕藻嚴正拒絕了周作人等人的邀請，始終沒有踏入偽北大一步，在抗戰勝利前夕離開人世。而進入偽北大數學系的馮祖荀，由於身患肺結核已於1941年離世^④。到抗戰勝利之時，留守北平的四位教授也僅剩下周作人了。由於周本人向來主張對日親善，這正是北大同人最為擔心的。雖然選擇南下的舊友曾多次勸其南下，但周以各種理由推脫。

此外，北大南遷之後不久，選擇南下的學人與選擇留守北平的學人之間的隙罅就早已顯露。在前者看來，繼續留守北平者無疑有充當漢奸的嫌疑。1937年9月26日，周作人在致陶亢德書信中曾經提及：「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教長蔣校長代為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⑤周本想一直做「蘇武」，卻逐漸變成了「李陵」。隨着華北臨時政府創辦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和「北京女子師範學院」（二者後來合組為北京師範大學）以及「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的相繼成立，一些留守北平的學人進入這些學校謀生，且有極少數人與日偽統治集團周旋，擔任了這些學校的重要職務。例如周作人不僅擔任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而且後來還擔任了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等重要職務。因此在抗戰勝利之初，北大當局如何處理教授中南下派與留守派之間的嫌隙，直接關乎到戰後北大內部的團結與穩定，這也將是影響北大今後發展的大問題。而對曾經進入偽北大服務的北大同人來說，他們則要面臨來自官方政治層面審查與同人道德層面審視的雙重壓力。

抗戰勝利之初，多數北大學人認為，在關乎到民族氣節的原則問題上，北大無疑應該為廣大青年學生做出表率。對於周作人的「投敵」，北大同人表現出相當大的關切與惋惜，實有「愛之深，恨之切」的意味。傅斯年之所以在處置偽北大問題上採取堅定的立場，是因為在他看來，這是關乎到北大純潔性的一個大問題。作為從五四學生運動脫穎而出的老北大人，傅一向重視知識份子應有的民族情懷，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激烈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已；他更認為凡關乎民族大義的問題，學者應該為青年學生做出表率。作為一個老北大人，此時正好又主政北大的傅，為了北大未來的發展，採取強硬手段「為北大保持一個乾淨的紀錄」，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北大即將回遷之際，對留守北平的原北大教職員的清算，無疑具有聲張民族大義與掃除北大「敗類」的多重意義。不過，與傅斯年持如此堅決態度不同的是，也有一些此時正在昆明等待復員的學人對之並不完全贊同。如他們就對昔日的同事、此時正在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擔任教授職務的馮承鈞的遭遇深感惋惜。馮承鈞曾在北大歷史系執教，後被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聘為長期編譯，「七七事變」後繼續留守北平翻譯西方經典。太平洋戰事爆發後，在基金會稿費來源斷絕的情況下，馮於1943年出任偽北大史學教職，並於抗戰勝利之初出任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教授。儘管傅斯年對馮的行為多有指責，但在昆明的北大舊友對之充滿同情。馮於1946年2月9日在北平逝世，家中一貧如洗，無錢安葬。遠在昆明的舊友向達、姚從吾、徐炳昶、聞一多與吳晗等人，在自身經濟狀況並不佳的情況下發起募捐活動，以救濟馮的家屬³⁵。遠在遵義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是在近兩個月之後的4月6日才得知馮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記中寫道：「閱覺明著《悼馮承鈞先生》文，知馮於本年二月九日去世。法國之Pelliot伯希和於去年十一月去世。東西漢學家先後萎折，曷勝惋惜。」他並聲言：「傅孟真之流多指摘，可謂苛矣。」³⁶在他們看來，主動進入淪陷區政權所設學校任職與被動接受這些職務還是有一定的區別，他們對那些因為生活所迫而進入偽北大服務的舊友多表示同情。

在隨後接收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的過程中，傅斯年等北大同人不僅對那些原來的北大舊人出任偽北大職務者（集中在偽北大的文、理、法學院），表現出毅然決然態度，一律不予聘用，而且對以上三個學院教員中的原本不是北大舊人者，也全部不在北大聘任之列³⁷。如對戰前曾在北大兼任講師的何作霖（此時正擔任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一分班地質系主任），以及此前與北大沒有發生關係，僅僅是1945年初才從輔仁大學轉任偽北大化學系主任的薩本鐵，北大方面也沒有給予任何的通融³⁸。然而即便是傅曾經高調宣稱拒絕一切偽北大教員，但在後來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也不得不有所變通。面對即將接收的第四與第六分班³⁹，傅怎會不知道就是原來的偽北大農學院與醫學院？不過，在這樣一個關乎到北大未來發展的大問題上，傅也並非是鐵板一塊，而是採取了非常務實的手法，彈性地處置這兩個分班的接收問題。

對即將接收的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四與第六分班，北大當局之所以表現出相當彈性的一面，其原因主要是為振興學術的現實需要，對兩個分班的教員盡可能地予以聘用，以充實即將興辦的農學院與醫學院。以偽北大醫學院教授為例，傅斯年對原協和醫學院教授、後來擔任偽北大醫學院院長的馬文昭，給予了相當的理解與信任。馬不僅被延聘到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擔任第六分班班主任，而且在北大完成復員工作後，傅還聘請他擔任北大醫學院院長。傅在1946年10月給胡適的信中，表示對馬曾經出任偽北大醫學院院長之職並無任何成見，反而評價他「是最誠實、最可靠、能苦幹之人」⁴⁰。此外，在1945年偽北大醫學院的28位中國籍教授中（另有10餘位日籍教授，抗戰勝利之後全部被遣送回日本），後來進入新的北大醫學院的有11人（其中只有細菌學教授方亮被北大當局改聘為副教授）⁴¹。

至於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的職員能否進入新的北大服務的問題，北大當局採取了與教員有點相類似的處置措施。1946年7月30日，教育部電令北大在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結束後，按其資歷酌予聘用部分職員。據9月北大方面的統計顯示，在所有被北大聘用的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職員中，主要是醫學院、醫院、總辦事處與農學院聘用的曾任偽職人員，其中醫學院52人，醫院106人，總辦事處128人，農學院12人。共計298人^②。由此可見，大批偽北大職員進入北大服務，這充分表明北大當局在對待偽北大職員問題上，與對偽北大農學院與醫學院教員的處置方法並無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更加寬鬆。

當10月10日完成復員任務回到北平的新北大舉行開學典禮時，確實沒有一個原來偽北大文、理、法學院的教員，進入新的北大教師陣營之中。北大謝絕了抗戰期間曾經就任偽北大的多數教職員，不過要是說北大完全做到了如傅斯年所言的保持一個「乾淨的紀錄」，似乎與事實不符。

四 餘論

從1945年8月抗戰勝利，到1946年7月北大接收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的第一至第四、第六共五個分班，持續了將近一年的偽北大處置問題終於告一段落。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一批北大學人，高舉象徵民族大義的旗幟，要為北大保持一個「乾淨的紀錄」，不僅是他們所堅持的民族氣節的集中反映，而且也是他們心中北大情結的自然流露。為了北大今後的發展，老北大人要在道德操守方面做出一個示範。在這場有關偽北大的爭辯中，北大當局確實拒絕了所有偽北大文、理、法三個學院的教員，有關何為「北大」，何為「北大人」的認識也更加清晰，北大的文化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然而，由於增設農學院與醫學院之後，北大根本沒有相應的師資與人員，使得北大當局不得不有所變通，讓一些原來曾經在偽北大服務的教職員進入北大繼續服務。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北大當局基本上採取了較為現實的手法來處置偽北大問題，即對北大原有的三個學院絕不任用偽北大的人，對北大新辦的兩個學院，則對那些原本不是北大人的偽北大教職員予以了相當程度上的寬容。總體看來，傅斯年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有維護北大純潔性和道德表率的考慮，這是他刻意建構和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一面；而不便明言的一面，則是他代表了還在昆明的北大同人的主流意識和利益訴求。因為他認為抗戰期間留守在北平的人員和南下人員之間將來必定不能融洽合作，所以在堅決拒絕了大部分留守人員的同時，對和南下人員並無直接衝突的醫學院與農學院的教職員，則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接受策略。

不過平心而論，傅斯年如此大張旗鼓地聲稱拒絕一切偽北大教員，必將給那些因為生活所迫而進入偽北大服務的教員心中留下陰影。抗戰勝利之初，對於那些長期生活在淪陷區的師生來說，他們所期待的，是來自政府與社會各界心理上的撫慰。然而，當勝利到來之後，這種精神撫慰不僅沒有得到，反而還被貼上了「偽」的標籤，這給他們心理造成的進一步傷害是不言而

喻的^③。而這些傷害是否由此引起這些學校的師生與國民政府离心力的不斷加劇，以及是否最終導致了抗戰勝利之後學界出現急劇分化與新的融合，則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註釋

① 本文為了行文方便，同時也是為了與抗戰期間在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體制之內的國立北京大學相區別，故將此間正在北大原址辦學、由華北臨時政府主持辦理的北京大學，簡稱為「偽北大」。

② 有關傅斯年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研究，傅樂成的文章給予了較為全面的回顧（參見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上、下），《傳記文學》〔台北〕，1963年第2卷第5、6期，頁17-21、26-31），其他一些論著對之的探討亦復不少（如歐陽哲生：〈傅斯年政治思想片論〉，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編：《北大史學》，第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90-114）。有關偽北大的情況，一些曾經擔任偽北大教職的教員有過一些回憶性的文章，如周作人的弟子沈啟無在文革期間的交代材料中，對偽北大辦理情形有所涉及（參見黃開發整理：〈沈啟無自述〉、黃開發：〈關於《沈啟無自述》〉，《新文學史料》，2006年第1期，頁63-85、頁58-62）。曹豆豆和陳翔的文章，分別對偽北大辦理期間的附逆文人做了簡單的介紹（參見曹豆豆：〈日偽時期的北京大學〉，《文史精華》，2005年第3期，頁13-19；陳翔：〈北大紅樓的「偽北大」歲月〉，《縱橫》，2010年第5期，頁49-52）。

③ 參見〈國立北京大學沿革紀略〉（1945年），載王學珍、張萬倉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861-1948）》（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1024。

④ 〈北京大學六學院歷年畢業生人數表〉，《朱家驊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301-01-09-092，頁42。

⑤ 以下資料來源自〈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教員姓名錄〉（1945年）、〈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員姓名錄〉（1945年）、〈國立北京大學理學院教員姓名錄〉（1945年）、〈國立北京大學工學院教員姓名錄〉（1945年）、〈國立北京大學農學院教員姓名錄〉（1945年）與〈歷年各科教授之變動〉（1945年）中的相關表格統計。參見《朱家驊檔案》，301-01-09-078、301-01-09-081、301-01-09-084、301-01-09-085、301-01-09-087、301-01-09-088。

⑥ 〈高等司復員小組第一次會議〉（1945年8月1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5，案卷號2100，頁17-19。

⑦ 1945年10月9日，通過已在八路軍中的兒子張光正，張我軍曾與八路軍幹部甄華等人（張我軍曾經的學生）聯繫前往解放區，但後來因故未能成行。張我軍只好輾轉於1946年春轉道上海回到台北板橋的老家。對於這段曾經在偽北大任教的經歷，很多學人一直比較隱晦，不願多向他人提及。詳見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頁528、543。與張我軍同船抵達台北的，還有曾經擔任偽北大日文系講師的天津人孫裕光。孫在抗戰勝利後亦被停職，隨後與家人一起（孫的太太陳玉真為台灣人）前往台灣尋找工作機會。參見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1-3。

⑧ 當日本投降之時，很多曾經出任淪陷區政權職務之人想盡辦法與之撇清關係，而周作人為何8月20日又覆信偽北大文學院，表示願意接受文學院國文系主任一職，此舉頗令人費解（參見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1885-196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頁698）。據張琦翔的分析，由於1944年王克敏兼任偽北大校長，周作人的文學院院長之職只好讓位於原校長錢稻蓀。錢還將周兼任的國文系主任一職也一併承攬下來，使得周在偽北大文學院受到排擠，幾乎不在偽北大文學院教員名單之上。日本投降後，周作人為了挽回當初的身份地位，不但回偽北大擔任起主任，而且還在課堂上講起課來。周上了不到三次課，因為「肅奸」開始，才不再到校上課。在張看來，此間反映出以周作人為首的

原北大派與以錢稻菘為首的原清華派之間的暗中鬥爭(參見張琦翔：〈周作人投敵的前前後後〉，載孫郁、黃喬生主編：《回望周作人·國難聲中》〔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44-48)。不過筆者認為，周作人此舉實為生計考慮，並無別圖。原來在華北政務委員會垮台之前，他依靠每月為其發放為數甚多的各類津貼過活，但在其垮台後各類津貼斷絕的情況下，他只好重新操刀回到偽北大上課，實在是不得不為之的舉動。另外尚需注意的是，對於部分學人來說，他們倒是認為自己曾經出任傀儡政權所設大學的教職並非是多麼令人不恥的行為，與出任傀儡政權職務有着天壤之別。這種心態在後來曾經引起廣泛爭議的容庚致傅斯年的信中有所反映(參見容庚：〈頌齋自訂年譜〉，載曾憲通編：《容庚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頁663-66)。

⑨ 〈收復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審辦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5，目錄號2，案卷號579。

⑩ 例如，當沈兼士9月中旬經過南京之時，看到「首都各校校長教職員均未離校，並欲繼續維持中」，他在致函朱家驊時認為，這樣的情形實在是萬萬不可(參見〈沈兼士來函〉〔1945年9月17日〕，《朱家驊檔案》，301-01-23-203，頁18)。然而當他9月底到達北平後，現實局面卻使他不得不改變此前的想法。此時的北平傀儡政權所設專科以上學校也同樣在繼續上課，而且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學校的師生對中央政府將會採取甚麼樣的政策尚在觀望，人心未定，一直處於動盪之中。

⑪ 〈教育部呈〉(1945年10月17日)，《教育部公報》，第17卷第10期(1945年10月)，頁34-35。

⑫ 以偽北大六個學院為基礎，分別改組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的第一至第六分班，第七分班是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基礎上成立，而第八分班則由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改組而成。參見〈各地臨時大學補習班先後成立〉，《教育通訊》復刊，第1卷第1期(1946年3月1日)，頁16。

⑬ 〈函陳雪屏〉(1946年1月5日)，《朱家驊檔案》，301-01-09-047，頁18。以往一些論者將鮑、徐、葛、梁四位教授誤認為偽北大工學院教授(如羅久蓉：〈抗戰勝利後教育甄審的理論與實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期下冊，頁216)，不確。參見〈歷年各科教授之變動〉(1945年)，頁5-8。

⑭ 〈傅斯年致蔣介石〉(1945年8月17日)，載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三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1625。

⑮ 參見〈傅斯年致蔣夢麟〉(1940年7月31日)，載《傅斯年遺札》，第二卷，頁1090。

⑯⑰ 〈傅斯年致胡適〉(1945年10月17日)，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48。

⑱ 〈傅斯年致胡適〉(1946年10月12日)，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133。

⑲ 〈嚴懲附逆教育人員教育復員會議昨一致主張，並決議請速解散各偽大學〉，《大公報》，1945年9月23日，第3版。

⑳ 〈傅斯年談話北大不聘偽教職員〉，《大公報》，1945年11月28日，第3版。

㉑ 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十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397。

㉒ 〈羅常培致胡適〉(1946年4月24日)，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103、104。

㉓ 〈傅斯年大放厥詞，平教育界頗為衝動，北平臨大當局表示該談話係個人意見〉，《益世報》(天津)，1945年12月6日，第2版。

㉔ 陳雪屏：〈北大與台大的兩段往事〉，《傳記文學》(台北)，1976年第28卷第1期，頁15-16。

㉕ 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396。

㉖ 〈陳雪屏來函〉(1946年6月8日)，《朱家驊檔案》，301-01-09-047，頁26-30。

㉗ 傅斯年：〈漫談辦學〉，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五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頁66。

㉘ 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28。

- ②⑨ 楊愷齡：《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65-66。
- ③⑩ 西北聯大到抗戰勝利前夕解體為國立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師範學院等五校。抗戰勝利之初，在北平大學復校的問題上，該校校友會在李石曾的支持下請求復校的呼聲很高。以朱家驊為首的北大派堅決抵制了他們的請求，用傅斯年的話來講：「北平大學也鬧復員（李五支持），簡直是與我們搗亂。」參見〈傅斯年致胡適〉（1945年10月17日），頁49。
- ③⑪ 〈傅斯年致湯用彤〉（1946年4月5日），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頁1682。
- ③⑫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392。
- ③⑬ 有關馮祖荀何時去世，有1940年與1941年兩種說法。本文採用的是1941年的說法，參見〈國立北京大學理學院教員姓名錄〉（1945年），頁3。該項資料顯示，馮一直擔任偽北大數學系主任之職，至1941年病故後，始由該系程廷熙教授代理。
- ③⑭ 周作人：〈與陶亢德書五通（四）〉，載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下冊（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頁504。
- ③⑮ 參見聞黎明、侯菊坤：〈聞一多年譜簡編〉，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七十二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65；文明國編：《楊憲益對話集：從〈離騷〉開始，翻譯整個中國》（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頁202-203。
- ③⑯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十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頁88。
- ③⑰ 參見〈國立北京大學在校教員名冊（截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底）〉，載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74-77。
- ③⑱ 何作霖後來在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介紹下，前往山東大學創建地礦系（參見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理學篇·地學卷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317）。而薩本鐵則在他的胞弟、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的幫助之下，於1946年初前往美國謀生（參見張藜：〈薩本鐵的前半生〉，《中國科技史雜誌》，2006年第4期，頁299）。
- ③⑲ 實際上朱家驊本計劃北大接收由偽北大六個學院改組而成的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一至第六分班，但傅斯年認為工學院難辦，轉而希望由清華大學接辦第五分班。不過清華方面也對之沒有興趣，所以最後只好由位於天津的北洋大學接收，改為北洋大學北平部。1947年7月，北平部由剛剛創辦不久的北大工學院接收，合併為新的北大工學院。有關北洋大學北平部的歸屬問題，參見賀金林、袁洪亮：〈1947年北洋大學北平部的歸屬風波〉，《現代大學教育》，2010年第5期，頁58-64。
- ④⑰ 〈傅斯年致胡適〉（1946年10月30日），載《傅斯年遺札》，第三卷，頁1725-26。
- ④⑱ 據〈歷年各科教授之變動〉（1945年），頁5-8、〈國立北京大學在校教員名冊（截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底）〉，頁174-77統計所得出的資料，可能會與實際情況略有出入。
- ④⑲ 〈教育部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即將結束經指定接收部分之教職員令〉（1946年7月30日）、〈發出曾任偽職應自聲明的通知〉，載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頁229、106。
- ④⑳ 如1944年考入偽北大工學院的劉桂敏回憶：在偽北大解散之後，他們被安置在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之時，心中的屈辱之感油然而生，因之他們當時就喊出了「只有偽政權，沒有偽學生」的呼聲。參見劉桂敏：〈大學生活及1948屆畢業典禮回顧〉，載北京大學校友會編：《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21-22。